



美国共和党预选
罗姆尼以8票胜出

1月3日,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米特·罗姆尼与妻子拥抱,庆祝罗姆尼以8票战胜前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克·桑托勒姆,获得胜利。



阿根廷总统手术
支持者祈祷

1月4日,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的支持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皮拉尔市的南方医院外守候,为克里斯蒂娜祈祷,等候手术的结果。



乌克兰批准季莫申科女儿
探视狱中母亲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新闻中心1月4日表示,乌克兰安全局侦查员已允许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的女儿叶夫根尼娅探视在哈尔科夫监狱服刑的母亲。



泰晤士河岸发现
古罗马妓院代币

一名名叫瑞吉斯·柯桑的考古爱好者近日在泰晤士河岸靠金属探测器发现一枚古钱币,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枚古罗马时期妓院代币。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从《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到新作《天子脚下》，雪珥撰写的系列近代史书籍，为晚清改革始末打开切口，暴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

周末感言

还是谦虚点好

雪珥：显微镜下读中国近代史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 叶祝颐

1月1日晚,雪珥从重庆飞抵北京。定居澳大利亚后,他频繁穿梭于国内国外,习惯于轻装简行。

雪珥发来的名片有两面。一面是“雪珥,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另一面印着“蒋文胜,商人、律师、记者、朋友、澳大利亚太平洋绅士”等社会职务。随着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名声渐起,雪珥更多地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读史而知兴替,其作品借古喻今的意味最为人称道。

1月份,他又有新作《天子脚下》面世。2日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某酒店,雪珥穿着休闲装运动裤出现在大堂,言谈衣着都极随意,并不像想象中的海外“绅士”那样讲究。

行万里路 从体制内出走

从名字到身份,雪珥都难以让人一眼看透。虽然已有数本著作,读者对他本人却知之甚少,甚至不知他是男是女。

在和记者交流的三个多小时中,他十分健谈,表现出坦率的一面。雪珥原名蒋文胜,浙江人,干过公务员、记者、律师,后来下海经商,做房地产开发。1999年,他凭借50万字的财经专栏,技术移民澳大利亚。

有跨度、有纵深的丰富经历,为他读史写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记者:采访之前看你的履历,感觉像一个谜。现在从事的主业是什么?

雪珥:目前国内国外两边跑,主业还是做生意、做贸易,读史写史是我的业余爱好。

记者:职业生涯发生了多次转变,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雪珥:我自认为是对社会现实接触比较早的人。17岁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校就读校领导做助手,开始了解社会生活复杂的一面。1991年毕业后在浙江团省委工作,几年下来平均每年写25万字的文章,无形中锻炼了对改革风向的嗅觉。后来在报社挂职做管理工作,同时在多家媒体撰写财经专栏。

我感觉,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在机关跟着工作组到基层蹲点,让我受益很深。浙江大大小小许多县我都去过,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因此我不迷信文件,也不迷信教科书上的历史。

1999年6月30日,我踏上了澳洲的土地。到悉尼之后,在一家大型金融公司从事金融管理。2003年,回国下海,在上海做房地产项目开发。真正做生意我才知道,之前写的财经专栏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地产项目的开发运作十分微妙和复杂,一个项目上有两百多个官司不足为奇。“非典”时期,我跑北京21次,和最高院的警卫都混熟了。我常说,房地产开发是“纸醉金迷密集型行业”,每天眼中都是大资本的运作,要去考虑各种关系的“勾兑”,也很容易让人迷失。

记者:忙于应酬哪有时间读史?

雪珥:看看我写了多少东西就知道,精力都放在那儿了。应酬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不喜欢。尤其是到了澳大利亚之后,晚上商店很早就关门,街上黑灯瞎火的,几乎没有社交活动。每天晚上8点到12点,凭空多出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可以真正静下心来写点东西。

记者:你解读历史的角度既不同于官方,也不同于学院派,这和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吧?

雪珥:正是因为我在一线干过,在潮头玩过,所以我不相信象牙塔里无菌环境下作的实验。我更倾向于把历史还原至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土壤中,思考实际问题如何解决。

细节比对 历史另外的可能性

从《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到新作《天子脚下》,雪珥在显微镜下看中国近代史,为晚清改革始末打开切口,暴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举个例子,他对保路运动的叙述让读者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1910年,持续三年火爆的上海股市崩盘,川路公司股本形成巨额亏空,铁路建设没有进展。中央政府想将铁路收归国有,并拒绝为炒股损失的300万两白银埋单。川路公司借此煽动小股东情绪,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借群众事件向政府施压。于是,有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在雪珥笔下,这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挑拨官民关系的案例。利字当头,运动往往与正义、非



正义无关。

记者:所谓的在显微镜下看中国近代史,你是怎么去做的?有关保路运动的历史细节,是如何获得的?

雪珥:因为在海外生活的缘故,我能接触到不少西方的历史记录,研究资料来源不限于国内,也不局限于当事的某一方,片面的材料只会导致不客观的结论。在历史研究中,我会使用律师思辨的方法,把各方提供的细节摆出来,由此推出结论,不言自明。

台湾出版的200万字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编》我精读了两遍,真实往往藏在被忽略的细节中。就算“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通过细节上的仔细比对,也能看出这个小姑娘当年的眉毛、眼睛大体是什么轮廓。

因为当过记者,写东西会考虑怎样的叙事更吸引读者。但事实上,我的文章语句句有出处,连天气、景色的描述都有资料来源。

记者:对于历史的解读,大众接受能力已经不再局限于教科书结论,也不再满足于主流提供的观点。你挑战了哪些主流的观点?

雪珥:在历史研究上,我不是很同意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阵营这种二元论的划分,而是倾向于三元论——把人分成官、民和既得利益集团三个阵营。官和既得利益集团有一部分重合,但不完全等同。官想要天下太平、国富民安,这和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既得利益集团却有可能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保路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记者:历史上“正”和“邪”的分野,随时可能发生颠倒。对恭亲王、慈禧、康梁等历史人物,你都表现出自己的判断。你的历史观是怎样的?

雪珥:不会。当时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都有史实可以证明。中国的改革史,始于1860年代恭亲王所推动的改革,至今已经超过了两个半世纪。从1860到1911年,晚清的50余年其实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根基和民族心理根基。

记者:80多年前媒体的这一评论,会不会是刻意厚古薄今、针砭时弊的舆论监督?

雪珥:不会。当时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都有史实可以证明。中国的改革史,始于1860年代恭亲王所推动的改革,至今已经超过了两个半世纪。从1860到1911年,晚清的50余年其实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根基和民族心理根基。

晚清的政治改革其深度、广度、力度,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与我们一般以为的情况不同,晚清最后6年,尤其是1909-1911的宣统朝的3年,国家并非每况愈下,政治、经济乃至国防都在不断进步。比如,1908年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了白银2亿两大关,史无前例。而政治上,到1909年除新疆之外,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地方议会,对地方行政领导实行非常有效的

监督,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央层面上,作为国家议会的资政院也随后成立。

记者:你认为以恭亲王为源头的晚清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改革?

雪珥:是的。我们经常批评1911年推出来的责任内阁,说它是“皇族内阁”。但是,这个“皇族内阁”并非传统概念上的权力极大的内阁,而是新型的,在国家议会的监督下的责任内阁,是个弱势的政府。这一点一直被忽略。这届内阁的总理,庆亲王奕劻也干得很别扭,多次想撂挑子。

记者:既然晚清的政经改革得力,为什么还会灭亡?

雪珥:1911年时,很少人认为这个政权会突然崩溃。但是,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这么大的一个政权土崩瓦解。主流的解释说是清政府假改革,改革太慢,而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太快,导致超速失控。

立宪运动启动后,从三权分立转为地方自治,实际上导致了立宪运动的变异,成了地方分离运动。一个很典型而被广泛忽视的情况是,到1908年,中国的年财政收入超过了2亿两白银,这是史无前例的,但中央财政所能掌控的,只有区区2400万两。一个政权,丧失了对88%的财政收入的掌控能力,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恶的能力,更失去了制止作恶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一个傀儡。

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深刻地论证过改革和革命的关系,他认为改革的推行必须依靠权威资源的保障,没有这一保障,改革一定会被人利用,最终走样,而成为改朝换代、取而代之的工具。到了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几个造反的军人,就引爆了一个政权的垮台,并不是什么革命的力量,而是这个政权早已四分五裂了。

民主的实现 关键是政治土壤改变

采访中,雪珥不止一次提到对韩寒的欣赏。他愿意看到更多年轻人对革命持一种理性的态度,这也和他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于一个开车时连打远光灯近光灯的规则都无法遵守的民族而言,激进的革命只会带来大规模的无序和灾难。”雪珥说。

记者:晚清改革的轨迹被辛亥革命打断,你认为这延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是这样吗?

雪珥:从甲午战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寻找“制度灵丹妙药”的阶段。精英阶层,尤其是体制外的精英,将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制度乃至执政者,以为换个制度——往往是换个制度的名称,换个执政者,就一切迎刃而解。这在之后的历史中,成了一种潮流。

精英们乃至全社会,不断地在“改制”的折腾中颠来倒去。辛亥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你争我夺的夺权混战之中,鲁迅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各路人马打着动听口号,其实只是为了夺权。甲午战败后带来的这股“主义”万能风潮,对中国的现代化造成极大的困扰。

政改不是换一拨人来当权。主义、意识形态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记者:你相信改革的效率要比革命更高?激进的革命对中国而言并不适宜?

雪珥:是啊,毫无疑问。治理国家就像运营一个公司,不停地更换股东,并不能带来公司效益、员工福利的提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经营公司。

这其实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公司治理是一门科学,国家治理更是一门科学。想要改善国家机器的运行状况,为什么不从实现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决策公开透明这些具体的层面去操作,非要拉下一群狼,换一群更饿的狼上台呢?

记者:建立更民主、更先进的政体,难道要靠执政者的自律来实现吗?

雪珥:没有任何理论敢于相信“自律”的力量,要靠更科学的管理制度来实现,即便是表面上的自律,也要靠外部的制衡和惩罚机制保障。必须注意的现实情况是,任何一个执政集团内部,都不可能真的万众一心,而存在内部的利益博弈,也有望形成内部的权力制衡——这也是执政集团自身健康的保障。晚清50年,“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这种“叔嫂共一国两制”并存的模式,体制内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分立和制衡。

权力本身是恶的,折腾只能带来更多无谓的消耗。我认为,关键是如何在技术层面寻找更科学的治国方法,去制约权力。民主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根本的是政治土壤的改变。

2011年12月24日,北大校长周其凤在长沙市一中举行演讲。演讲中多次赞颂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以至于很多学生或者老师都觉得周校长此行就是搅生源的。周其凤称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尊重人,总把自己意愿强加于别人。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很成功,理由是中国经济多年来都在飞速发展。(2011年12月25日《潇湘晨报》)

不可否认,北大是中国内地名校,中国经济近年来确实发展很快,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确实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是,周其凤校长据此认为,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批评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不说是自吹自擂、夜郎自大,至少是“王婆卖瓜”,缺乏说服力。

去年6月,周校长在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上表示,在1999年至2010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北大培养出大批富豪,成绩确实不可轻看。但是,换个角度看,出富豪最多只是证明北大办学成果的一个方面,决不是评价大学好坏的唯一依据。有论者曾尖锐质疑,中国不缺富豪,而缺大师,北大的办学成果为何不是培养79位大师,79位大慈善家呢?作为“中国最好大学”的北大,不着眼于培养大师,不着眼于大学精神发扬光大,一味把北大走出去的富豪作为炫耀的资本,让人感觉北大就是在宣扬拜金主义。何况,这79名亿万富豪的成功,并非全是北大的功劳。他们中有人在其他高校学习过,也有人有过留学经历。他们的成功史与他们的个人努力与时代机遇息息相关,北大怎能将“创富”成果都归入自己的门下呢?

至于周校长批评“美国教育一塌糊涂”,本身也是“一塌糊涂”。美国总统不尊重人,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这种不讲道理的霸气确实不受人待见。与我们的传统儒家文化格格不入。但是,美国总统的霸气与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有关,并非都是美国教育的错。而且,值得追问的是,“一塌糊涂”的美国教育为何造就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何吸引那么多中国学生?北大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为何落在美国大学的后面?其实,美国教育“一塌糊涂”也好,北大“最好”也罢,关键要得到社会与学术界的认可,北大校长说了不算。

其实,不仅哈佛、耶鲁、麻省等美国大学把北大甩在后面,就是在中国,许多高考状元也放弃北大、清华,奔香港大学而去。坊间就有“港大将北大、清华归为二流大学”的议论。再加上北大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招生制度与连年扩招政策,让大学生源质量、教育质量受到质疑。与美国大学与香港大学相比,北大等内地大学教育模式、管理理念显得滞后。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大学之谓,非大楼也,乃大师也”。但是,毋庸讳言,近年来,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大学房子越盖越豪华,但是普遍有精神失落的倾向:大师难出、学术腐败、竞争缺失、官僚主义、拜金主义,这些都制约了大学的发展与变革。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何大学都会有压力,谁也不能轻易说自己“天下第一”。北大与其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还不如把美国教育的挑战当做前进的动力,虚心向人家学习,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多掌握一点自救的本领。